

An Enlightenment that Rejects Pleasure: Five Tragic Dimensions of Su Tong's Works

Bo Yang¹; Amornrat Netthanyakonwong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Naresuan University, Phitsanulok 65000 Thailand
E-mail: islandsyang@hotmail.com

(received 13 March, 2023) (revised 16 May, 2023) (accepted 1 June, 2023)

Abstract

Su Tong is a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whose works are mostly tragedies. Su Tong's tragedies have both breadth of life and depth of thought, and a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occurrence, reflecting his humanistic concern in many dimensions. This *research*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urpose is to prove that Su Tong's tragedies are not written for the purpose of artistic "pleasure", but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Lu Xun's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This study selects eight representative tragic works of Su Tong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s source texts and summarise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his tragedies: (i) the physical dimension; (ii)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iii)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v) the social dimension, and finally, (v) the fate dimension. This breaks the convention of studying only a single work or character of Su Tong's tragedies and expands the depth of research of Su Tong's tragedies. The five dimensions of Su Tong's tragedies present a progressive and closely integrated situation, an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se five dimensions, we use Zhu Guangqian's theory of "tragedy pleasure" and Lu Xun's theory of "almost nothing in tragedy". The study found that Su Tong's tragic writings reject "pleasure" as the goal, but continues and expands on Lu Xun's concept of tragic writing for the purpose of "enlightenment". This study summarises the line of development of Su Tong's tragedies from the external to the internal, and present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profoundly enlightening connotations of Su Tong's tragedies.

Keywords: Su Tong; tragedy; pleasure; enlightenment; dimensions

¹ Corresponding Author

拒绝“快感”的启蒙：论苏童悲剧的五个维度

杨搏²；易青媛³

泰国纳瑞宣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系中文部

邮编 65000 邮箱：islandsya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23. 3. 13 修回日期 2023. 5. 16 接收日期 2023. 6. 1

摘要

苏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多是悲剧。苏童的悲剧既有生活的广度，也有思想的深度，对悲剧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刻探索，从多个维度体现了他的人文关怀。本研究为定性研究，目的在于证明苏童的悲剧并非以艺术的“快感”为写作目的，而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启蒙”精神。研究选取了苏童不同时期的八部代表性悲剧作品为资料文本，总结出其悲剧的五个维度：首先是肉体层面，其次是精神层面，第三是文化层面，第四是社会层面，最后是命运层面。这打破了只研究苏童悲剧单一作品或人物的惯例，拓展了苏童悲剧研究的深度。苏童悲剧的五个维度呈现出一种递进且紧密结合的情状，对这五个维度的分析，我们使用了朱光潜的“悲剧快感”理论和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理论。研究发现，苏童悲剧创作拒绝了以“快感”为目的，而是延续和拓展了鲁迅以“启蒙”为目的悲剧创作理念。通过本研究，可以总结苏童悲剧由表及里的发展路线，全景式地展现苏童悲剧的深刻启蒙内涵。

关键词：苏童、悲剧、快感、启蒙、维度

1. 引文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过两次启蒙运动，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量现代西方思想和理论进入中国，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和愚昧发动了“启蒙”。当时对中国文学的改造是启蒙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期间，中国开始接受和消化西方悲剧理论，出现了两位重要的理论家，一位是朱光潜（1897—1986），另一位是鲁迅（1881—1936）。朱光潜的悲剧理论主要存在于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这是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士论文，1933年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这部论著以悲剧杰作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对各家的悲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和综合性分析。从心理学、美学、文学批评的角度，全面构建了悲剧快感理论，该著作不仅填补了西方悲剧心理研究的空白，而且是中国文艺理论尤其是悲剧理论的里程碑。（Jiao, 1995）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几乎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Qian, Wen, &

² 杨搏，男，泰国纳瑞宣大学东语系中文专业讲师。

³ 易青媛，อาจารย์ ดร. อมรัตน์ เนตรธัญญกรวงศ์，女，泰国纳瑞宣大学东语系中文专业讲师。

Wu, 2007) 他的悲剧创作, 是在对尼采悲剧理论的接受和改造的基础上, 融入马克思主义悲剧理念, 将西方悲剧与中国悲剧美学特征结合为一体, 是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统一。(Shi, 2001) 虽然他没有留下专门的悲剧美学著作, 没有建立自己的悲剧理论体系, 但是他在许多作品和言论中表现出深刻、精辟的美学见解, 是 20 世纪初对中国悲剧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具有卓越创造性的理论家。(Zhang, 2008) 朱和鲁的悲剧理念有一部分共识, 比如他们都对中国悲剧作品“大团圆”结局的否定, 但二者更多的是不同, 朱光潜是站在艺术家的角度来批评悲剧, 强调悲剧的“快感”, 强调悲剧对现实的过滤、具备崇高和命运感等, 而鲁迅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 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无事的悲剧”, 也就是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

朱和鲁的悲剧理念都是西方悲剧理论中国化的代表, 并对中国悲剧的创作影响极深, 但却极少有学者从二者的理论和观点来看待 198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中国, 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作品是一种常态, 但没有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学作品, 每一句话, 甚至每一个词语都蕴含着中国式的思维, 也与传统中国文化连接, 这种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做法并不一定合适, 两百多年前 Pope 就在《莎士比亚全集序》中说: “用亚里士多德的规则去评判莎士比亚, 无疑是用此国的法律审判依据彼国法律行动的人。” (Pope, 1728) 中国学者也指出“西方理论在西方本土有其历史与合法性, 可是一经转移, 西方理论的诠释力可就相应减低, 因此不应强加诸中国文学。” (Zhou, 1990) 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批评也多认为他受西方影响极深, 但“一些评论家把苏童的精神源头定位于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身上, 实在是有些误解, 苏童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气息, 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土壤里的作家, 他的作品有唐诗和宋词的意境。” (Ge, 2003) 目前, 西方批评理论代表先进, 用中国本土理论家的观点出发来批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有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悲剧”。本论文用朱光潜和鲁迅的悲剧理论, 来分析苏童的悲剧作品, 即是打破这一不合理现状的尝试。

中国的第一次启蒙并没有完成, 二战和国内战争是主要原因。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随着文革结束,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中断了近 50 年的五四启蒙传统于此时得以接续。(Zhang, 2009) 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 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才具有启蒙性质, 而苏童“从 1987 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受到注意起, 他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的主将”。(Chen, 1999) 苏童大多数作品都是悲剧, 一般认为他受到塞林格、马尔克斯的影响极深, 极少有研究认为苏童的悲剧与鲁迅启蒙式的悲剧理念是有积极联系的。例如有学者认为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 放逐了启蒙叙事对人生和世界未来的期许, 建构了远离宏大历史叙事的死亡诗学, 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 (Wu, 2012) 也有学者认为以鲁迅为主的启蒙主义者都坚持“文化进化论”, 而苏童打破了 20 世纪主宰中国文学创作的启蒙主义。将苏童与鲁迅对立, 甚至对启蒙是悲观的。(Ge, 2003) 这些观点都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苏童的悲剧, 和朱光潜的悲剧理论想通, 从而认为它们充满“快感”。作者认为, 仅从外在的创作方式, 否定苏童作品的

启蒙性是值得争议的。文学作品，其内涵远比形式更重要，强调苏童作品表现出来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特色，忽视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并不可取，粗犷地将他的作品归于先锋文学也是不准确的。作者认为苏童的作品融合了反思文学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寻根文学对中国文化的重塑、先锋文学的个人对生命的体验，他是这次启蒙时期的集大成者，是新时期 30 年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研讨苏童的作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很好的总结。(Xu, 2010) 我们通过分析他的悲剧作品，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结论，他的悲剧创作，是拒绝以让读者达到“快感”为目的，而是选择了鲁迅式的对读者的启蒙。

苏童的悲剧人物、事件众多，共同组成了一部宏大的历史场景，从民国到 21 世纪，从乡间到城市。研究中发现，苏童的“启蒙”是全面的，具有尼采的“超人”的品质，但并不是尼采式的勇敢和积极的超人，而是被鲁迅“中国化”了的“超人”：既一种社会的反叛者和对抗者，但他们的反叛和对抗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失败，然后开始软弱和逃避。在引起“恐惧和怜悯”之后，都是无尽的压抑之感，对人生的虚无之感（这是有悖于尼采的“超人”的），鲁迅的悲剧作品总会包含希望，而苏童并没有这样，这是对鲁迅悲剧理念的一个突破，同时也强化了鲁迅认为的悲剧不应该有“瞒和骗”的观念，更忠实现实的残酷，没有像朱光潜认为的悲剧要过滤现实。可以说鲁迅给中国悲剧带来了最现实的创作理念，苏童就是这理念的实践者，同时，鲁迅在第一次启蒙时期给悲剧创作树立了典范，主要体现在人性（中国人的劣根性）、社会和传统文化方面的批判，而对一些细节如欲望、精神追求都少有涉及，对命运的讨论也不是鲁迅关注的重点，苏童在第二次启蒙时期创作大量悲剧人物和内容，细致地填补了众多启蒙的空白，它不仅与鲁迅的启蒙思想吻合，更是极大的发展。

作者通过分析发现，苏童对中国社会的启蒙涉及到以下五个维度：1. 身体维度的启蒙 2. 精神维度的启蒙 3. 社会维度的启蒙 4. 文化维度的启蒙 5. 命运维度的启蒙。结合朱光潜和鲁迅的悲剧理论，可以说本论文这是对苏童悲剧作品的一次详细解剖，以他的作品为资料，证明他对朱光潜悲剧观的拒绝，对鲁迅悲剧观的接受，可以更整体地展现苏童悲剧意识，展示苏童如何是通过他的悲剧作品，对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的“启蒙运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总结。

2. 文献综述

通过在中国最大的数据库知网，输入“苏童”、“悲剧”两个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发现相关论文 26 篇，这说明对苏童悲剧小说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分析发现，这些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专门针对苏童某个悲剧作品研究。例如：

姜晓梅（2019）认为《河岸》中苏童改变了以往的虚化历史、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创作方式，开始直面历史并进行理性思考，展示了人物命运与具有荒诞性的历史的纠葛，给人以悲悯和关怀。吴俊熹（2021）从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对立冲突，分析了《妻妾成群》叙事空间与颂莲悲剧成因。陈晓明（2007）认为《罍粟之家》具有

丰富的小说元素，最具特色的是它将人类的欲望放进历史中进行考察，展示了人类历史的颓败。杨秀婷（2019）总结了苏童悲剧“逃亡”和“落网”模式，进而分析苏童悲剧作品《茨菰》是对人性黑暗做出了理性的审视；丁昭艳（2017）从意象的隐喻来发现苏童悲剧《黄雀记》中人物对现实的逃避，并认为这是整个社会时代的悲剧缩影。

第二种是苏童悲剧小说中人物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关注苏童悲剧中的女性，例如王亚琪（2021）认为苏童对女性欲望的发掘和精神世界的描写，展示现代早期女性在历史缝隙中的悲剧性命运与生存状态；吴万贵（2012）马嫦秀、张国斌（2017）等讨论了苏童作品中女性悲剧的根源；刘娟、卜立进（2015）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比了苏童和福克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指出苏童更关注女性自身的弱点，以及潜伏于内心身处的文化结构；陶慧（2017）对苏童作品中男性人物的悲剧进行了总结，认为男性主体性缺失引发的悲剧值得深思。

第三种是从美学角度对苏童悲剧小说的研究。例如：

赵艳茹（2011）分析了苏童小说中的“感伤”格调，认为苏童的悲剧呈现出一种“哀而不怨”的审美格调，折射了作者内心深处的孤独、恐惧的生命体验以及强烈的自审意识。吴飞（2018）认为苏童悲剧作品中对“丑”的表达是荒诞的，它们开辟了新的表达途径，是作者本质上的人文关怀，是对美的折射。朱虹（2017）通过发现苏童小说中疾病的种类、特征，思考疾病所隐喻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认为苏童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学中的疾病书写传统，审视并记录病态社会的病态灵魂，而且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理论创作影响了苏童的审美选择。

此外，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苏童研究资料》非常详实且多方位地展现了苏童文学的主题、形式、内涵等。书中认为苏童的创作从形式的激进转为故事的营造，已转向的姿态完成了历史的定格。（Wang and He, 2007）从本研究的角度，这意味着苏童的悲剧创作开始从艺术的实验性，也就是悲剧的“快感”，转向对历史、社会和人物的高度重视，也就是悲剧的“启蒙”。也因此，书中认为苏童这一创作的转向挽救了先锋派。（Wang and He, 2007）Li hua的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Su Tong and Yu Hua: Coming of Age in Troubled Times* 对苏童“枫杨树”和“香椿树街”系列作品进行了总结，认为他们与德国作家歌德的“教育小说”有共同之处：它描写了主人公在开始和成长到某个完整阶段的形成/教育/文化；其次还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描写，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读者的成长。（Li, 2011）而“教育”与“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的，这也为本文的观点进行了佐证。

总体看来，目前从悲剧角度对苏童作品的研究数量有限，而且有极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尚未有从中国悲剧理论的角度对苏童悲剧作品进行研究。也极少对苏童悲剧作品与“启蒙”联系。

(二) 主要以单个作品为研究对象，没有通过大量作品进行总结。苏童的作品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对组成这个庞大体系的一小部分的研究，只能展示细节，却无法展示苏童悲剧的全貌，更无法发掘内在的深意。

(三) 主要以苏童作品中某个人物的悲剧为研究对象，即便是对群体的研究也集中在以性别划分的女性和男性两方面，没有发现这些人物在其他维度的共性。

综上所述，目前对苏童悲剧的研究有不足之处，尚未有从悲剧理论的角度，总结苏童悲剧在启蒙方面的层次，这给我们留下了研究空间。此外，苏童的写作仍旧活跃，且其风格和内容不断突破，通过本研究，可以对其未来的新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这必然会带来新的研究热点。

3. 研究资料

苏童的悲剧作品数量巨大，总共可分为四类主题。

第一类是以“枫杨树”、“香椿树街”、“城北地带”等地理标志创作的小说。这类似于福克纳作品中，以约克纳帕塔法县 (Yoknapatawpha County) 为地理核心构建的文学模式。在苏童的小说中，“枫杨树”代表乡村，多以乡村宗族想象作为叙事基础，表现乡村的自然与淳朴，以及野性和堕落，同时也纠结着传统与反抗，逃离与还乡，欲望与死亡等主题。而“香椿树街”“城北地带”代表街道和小镇，多以少年视角来叙事，展示青少年的野蛮生长，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中青少年与社会的碰撞与冲突。

第二类是以“妇女生活”为主的小说。苏童在中国文学界被评为“最擅写女性的男作家”。对于这个评价，苏童认为他“从没刻意写过有魅力的女人，写的都是一身毛病的女人。” (Yu, 2019) 这也展示了女性在苏童小说中的悲剧定位，她们被自身性格以及传统和社会、现实生活所碾压和消灭。

第三类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有的虚构了历史场景，例如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承认小说中的燮国宫廷，是他“随意搭建的宫廷，所写的故事也是他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 (Wu, 2012) 再比如在《碧奴》中，苏童对传统的孟姜女故事进行了重塑，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人物，减轻了阶级斗争的重量，突出了人的自我救赎并融入对人的生活、生命的思考。

第四类是关注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苏童的虚构是以现实或真实为基础，例如苏童说在长篇小说《河岸》中，“有明显的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自己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自己的故事背景。” (Qi, 2009) 并且在采访中声明“这次我是郑重其事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描绘 1970 年代。” (Pu, 2009) 另一个描写现实的长篇《黄雀记》的故事主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苏童身边的一起青少年强奸案，苏童由此反思现实社会中人们恐怖的遗忘能力，探讨人的理性如何面对“传统”的温柔的消磨。

为了能全面研究苏童的悲剧，我们选取了这4种小说中的代表作，总共8部作品，作为研究资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研究选取苏童悲剧作品

序号	作品名	出版年份	主题类别	小说种类
1	少年血	1993	1	短篇小说集
2	世界两侧	1993	1	短篇小说集
3	妻妾成群	2019	2	中篇小说
4	红粉	2004	2	中篇小说
5	米	2019	1/2	长篇小说
6	我的帝王生涯	1992	3	长篇小说
7	河岸	2018	4	长篇小说
8	黄雀记	2013	4	长篇小说

4. 研究目的

- 4.1. 研究苏童悲剧的维度及各维度内部细分类型。
- 4.2. 研究苏童悲剧与“启蒙”的关系。

5. 研究方法

5.1 对苏童悲剧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总结苏童悲剧在5个维度上的启蒙表现。

5.2 对朱光潜的“悲剧快感”理论和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理念进行归纳提炼和概括。明确研究使用的理论资源。其次将理论用于苏童悲剧作品的分析。

朱光潜的悲剧快感理论和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念上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朱光潜否定恶意说，将悲剧产生的同情分为道德同情和审美同情，认为道德同情与悲剧的创作动机是相抵触的；而鲁迅承认人类的恶意，重视与现实相关联的道德同情。

第二，朱光潜认为对悲剧人物的怜悯与对命运的恐惧可以产生悲剧快感；而鲁迅则强调社会批判，“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的思想文化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包括打破对命运的恐惧。（Qian et al., 2007）

第三，朱光潜认为悲剧必须有崇高感，首先是人物身份的崇高，其次是对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的敬畏与惊奇，以及激发出来的生命力。而鲁迅认为悲剧必须是“为人生”的，特别关注发生在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其次是，启蒙人们反抗和革命，通过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来改变人的命运。

第四：朱光潜认为悲剧要与读者有心理距离，悲剧反映的社会必须是“过滤了的现实”，“以实际生活中所见的苦难来讨论悲剧，是完全错误的。”（Zhu, 1985）而

鲁迅认为悲剧是现实主义的，关注现实如何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以及没有“瞒和骗”地反映现实人生。

结合以上理论，对苏童悲剧的 5 个维度分析发现，表面上看苏童的悲剧具有朱光潜认为的快感，首先他虚构了众多场景，例如风杨树和香椿树街，可以看做是朱光潜的过滤了的现实，让读者对故事有心理距离。但出现在这两个虚构之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当前社会上常见和熟悉的，是对现实的无距离的再现。其次，他的人物都在命运中反抗和斗争，这是命运感的表现。但人物的结局，都是对命运的逃避和顺从，命运感完全消失。再次他的作品也有一些英雄受难的故事，例如《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符合“崇高”的悲剧理念。但苏童作品中更多的是大量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Shi (2008) 认为“先锋文学”的这种现代主义悲剧直面日常生活，解构伪理想，解构伪崇高。揭开表面，就会发现，苏童的悲剧都会落在鲁迅的理念上，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对人性的揭露很直接，没有“瞒和骗”，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的悲剧不但没有消除距离感，反而接近读者的情感经验，是一种“为人生”的悲剧创作。研究证明苏童拒绝了以“快感”作为悲剧创作的目的，选择了鲁迅现实主义的悲剧观，有强烈的启蒙内涵。

5.3 文学反映广阔的社会、历史以及人文，因此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借鉴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6. 研究发现

通过对苏童小说悲剧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具有五个维度及其细分内容。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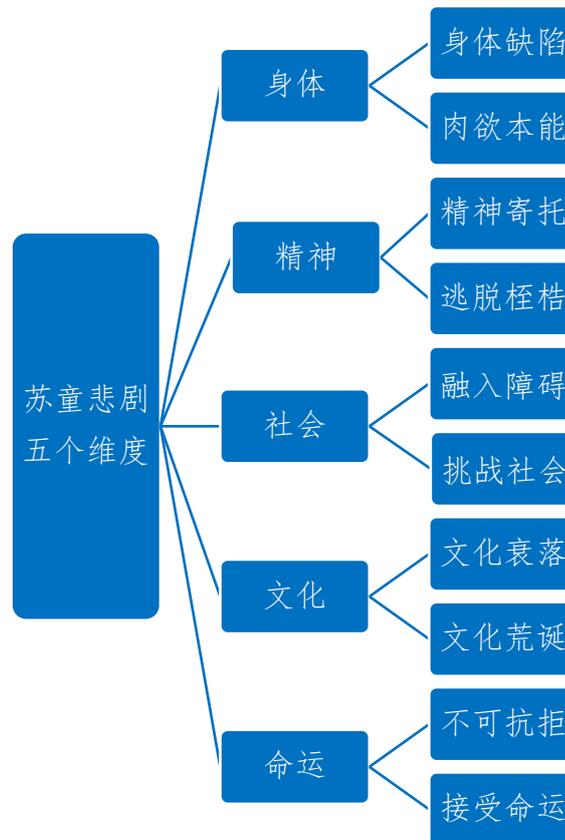


图 1：苏童悲剧的五个维度及其细分

6.1 身体维度的启蒙

在苏童小说悲剧的身体层面，制造悲剧的是身体缺陷和肉欲本能。

苏童许多作品中都展示了人们对有身体缺陷之人的恶意。例如《刺青时代》中的小拐，他的身体残疾不但没有得到他人同情，反而成为嘲笑和欺辱的缘由。《舒家兄弟》中，已经十四岁了还尿床的舒农，即使最后克服了这身体缺陷，仍无法摆脱悲剧结局。《南方的堕落》中茶馆老板金文恺，由于性无能终日躲在房间，身体如僵尸苍白没有血色，多年不说话，被认为是哑巴。他的身体缺陷撕碎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底线，加速他的死亡。还有《骑兵》里的有罗圈腿的左林，《古巴刀》里的因为虚弱经常被欺辱的陈辉等等。首先这些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见的普通人，与读者没有朱光潜所强调的“心理距离”，他们的身份也并不符合“崇高”的概念。相反，他们和鲁迅作品中的狂人、阿 Q、小栓等人有相通之处，除了身份的缺陷和低微，他们也处在被侮辱，被救赎，或者自我救赎的情状。其次，朱光潜否定了法国学者法格的“恶意”导致悲剧的观念，即人性中确实还残存这原始的野蛮残忍，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而通过苏童悲剧中身体有缺陷人物的遭遇，展示了人类的“恶意”的真实存在，这也回应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所说的“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的观点。鲁迅承认这是人对本性，“无恶意的闲人”和“有恶意的闲人”都是其作品中常见的人物，这在苏童的悲剧中一脉相承，甚至更进一步，身体缺陷不但没有被同情，更被“恶意”之人毁灭尊严，最终导致肉体或灵魂的死亡。同时，上述人物多出现苏童“香椿树街”系列中，这些作品与德国作家歌德的“教育小说”有共同之处：它描写了主人公在开始和成长到某个完整阶段的形成/教育/文化；其次还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描写，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读者的成长。（Li, 2011）而“教育”与“启蒙”在目的上是同义的。

此外，肉欲本能造成的悲剧在苏童作品中比比皆是。在诸如《米》《罍粟之家》《河岸》等作品中，苏童“极力渲染性欲在人类生存历史里的重要性，颂莲、倚云、梅珊、五龙们的生命维系似乎全在一个‘性’字上。”（Liu, 2006）肉欲是导致悲剧的源头之一。朱光潜认为在欣赏悲剧时，力比多（libido）是一种推动生命前进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起欣赏主体的情绪，给我们带来快感。（Tao, 2013）力比多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重要概念，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但我们在阅读苏童悲剧时，并不会感到这种“快感”，因为苏童并不是以“性”描写此作为噱头来吸引读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性压抑和性创伤，它们有点像乌云笼罩在小说中，极端处可能令人不悦，但无论读者是否乐意接受，我都得写，这本身也是我的一个叙事目标。”（Zheng, 2009）苏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让人不悦的方式写肉欲。肉欲作为人的本能，原本是人类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它应该是简单和快乐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被压抑或禁止、伤害，因此才让人产生了对性的追求和对种种性的攀篱的突破，也因此导致一系列悲剧。在“五四”时期，众多文学作品启蒙民众的现代性爱意识，以达到个性解放的目的。当时，鲁迅是引介佛洛伊德学说的较早的、较有影响的一位人物，鲁迅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戕害和正常人性的扼杀，而且对“性”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进行确认，实际上是对佛洛伊德的生命本能论、性欲论、人格结构学说给予了继承和发展。（Huang, 2008）五四时期的启蒙因为战争等原因的中断，导致这一传统道德中压抑人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在第二次启蒙时期，苏童的创作承上启下，他对性毫无忌惮的描写，有时甚至是夸张和暴力的，但其实，这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展现，是继承自鲁迅的对真实生活的再现，其终极目的是通过悲剧启蒙人们感知“性”的快乐。正如他与著名学者李敬泽的对话中所示：“《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的性是快乐的性，因为创作者对性的理解很单纯很民间，写性的态度是快乐的，文字自然也快乐，快乐的文字看上去天生是自然的，惹人喜爱的。”（Su, et al., 2006）可见文艺复兴时期这类具有社会启蒙性质的作品对苏童创作影响的深刻。如果说鲁迅对佛洛伊德的确认是为了否定封建思想对人性的压抑，那么苏童对肉欲悲剧的创作不仅与鲁迅殊途同归，更是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及其‘禁欲主义’理念进行了有利揭露和批判，两者有着相通的启蒙的目的和价值。

6.2 精神维度的启蒙

苏童多在小说中使用各种意象来表达精神诉求。主要分为“寻找精神寄托”和“逃脱精神桎梏”两种。

在《刺青时代》中，全篇都在围绕小拐对野猪刺青的执着，他希望通过刺青来追寻精神上的完整，进而弥补身体的缺陷。在《骑兵》中，身体有缺陷的左林不停地幻想出一匹白马，并不知疲倦地寻找着白马的踪迹，这也体现了他的精神向往。还有《舒家兄弟》中舒农想象自己变成一直猫，直到最后坠楼时仍发出猫的叫声。猫代表了舒农对压抑的生活的反抗，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朱光潜认为在欣赏悲剧时，怜悯和恐惧是可以产生悲剧快感的，而且这两个元素缺一不可。以上几个人物的经历都是让人怜悯的，但仅有怜悯还不是真正的悲剧效应，真正的悲剧除了要唤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惋惜之情，还要赞美其坚毅不屈的精神，这是由恐惧感激发出来的。（Ding, 2020）然而我们看到，小拐对伤害他的人求饶，左林精神失常，舒农跳楼而死，他们毫无坚毅不屈的精神。而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情形，例如《风波》里大家对“辫子”的寻找，就是发自一种对精神寄托丢失的恐惧，《祝福》中祥林嫂对“捐门槛”的坚持，是来自她对地狱的恐惧，这都是在“寻找精神寄托”，他们都落入无尽的恐惧。现实中，对恐惧的斗争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苏童悲剧中的屈服，像鲁迅一样没有“欺和瞒”地表现现实，正式苏童悲剧的启蒙方式。

在“逃脱精神桎梏”的悲剧中，苏童仍旧营造了恐惧，同时我们无法怜悯剧中的人物。《南方的堕落》颇具代表性。首先是文中的一些次要人物给人的震撼和思索。梅家茶馆中的茶客就是精神极度空虚的代表，他们靠打听和谈论别人的生活隐私而消磨宝贵的时间，在对别人的生活的窥探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这其中也有“我的爷爷”，他因为梅家茶馆两年没有开门而变得脾气暴躁，进而精神恍惚，最后变成了疯子，这些茶客营造了一个精神牢笼。其次是金文恺对“我”说的“孩子，快跑”这句话，它贯穿小说全篇，多次出现。它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说的“救救孩子”有异曲同工之处，狂人就是精神病人，苏童的小说中，金文恺同样被认为是精神病人。狂人说“救救孩子”，意在反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而要改造国民性。金文恺口中的“孩子，快跑”，意在让这身体健康，思想纯洁的少年逃离这空虚无意义的吃人街道，去寻找精神的饱满和生命的意义，不要堕落成梅家茶馆的一员茶客。小说最后一句“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Su, 1993, p. 201）灵魂的冤屈意味着失败和妥协，这是最大的精神悲剧，苏童又一次拒绝了“赞美坚毅不屈的精神”，启示读者对自身所处的现实进行思考。

6.3 社会维度的启蒙

主要体现在两种情况，一是个人无法融入社会，二是个人对社会的挑战失败。

朱光潜的悲剧快感理论认为，欣赏悲剧必须有“心理距离”，才能区分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悲剧中的痛苦与现实中的苦难是有本质不同的。(Tao, 2013) 悲剧中所反映的现实是一种艺术“过滤了的现实”，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苏童的悲剧中，虽然他虚构了故乡枫杨树和香椿树街，甚至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虚构了历史和国家，但我们从中完全可以与真实世界对照，更有不少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例如他的《红粉》就是以新中国建立后对妓女的改造为背景而创作。秋仪与小萼，这两个旧时代的妓女的悲剧有她们个性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所依存的“时代”被突然消灭，她们要被“改造”为能够适应“新时代”的独立的人。然而秋仪与小萼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无法融入新社会，并且对“旧社会”的妓女生涯无限迷恋。而《米》里五龙的故事，可以看做是对鲁迅的《故乡》，或者沈从文《边城》的“黑化版”的改写。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鲁迅和沈从文都一定程度上对南方有诗意的描写，充满了旧时美好时光的怀念，通过现实与过去的对比，让悲剧自然地发生。但苏童直接暴露现实的邪恶与野蛮，他的写实更加直接和暴力。鲁迅的悲剧鼓动革命，旧社会推翻了，人就会变得更好。这在他的继承者赵树理的作品中有直接体现，他的经典《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三仙姑是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反面角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这都显示了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制约作用。”(Qian et al., 2007) 人可以改变，可以融入社会，这也是鲁迅“社会进化论”的启蒙观点。由于时代不同，革命已经不是第二次启蒙时期的焦点，苏童的作品没有简单地表达人的融入，更关注人性中不变的部分和时代的冲突，引导人们思索当与社会无法相处时的解决路径，那就是如何重塑自我。

而重塑自我，常常意味着挑战社会，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以苏童著名的作品《妻妾成群》为例，Ma and Zhang (2017) 认为是男权社会、封建思想导致颂莲的悲剧；Zhou and Shi (2020) 认为颂莲自身性格因素是导致悲剧的主因。极少学者发现苏童的这部作品是在鲁迅悲剧观的指引下，对易卜生《娜拉》的以悲剧为结局的中国式续写。《妻妾成群》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而当时中国刚经历过“五四运动”，年轻人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洗礼。当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中国影响巨大。有学者指出：世上不知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创作了如此众多的娜拉型剧本，中国人把娜拉迎进家门，进行新的创造，使她在中国复活再生。这里有从沉重中醒来的娜拉，也有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革命的娜拉。(Zheng, 2008) “娜拉”形象深入人心，中国女性开始觉醒，认识到女性应该通过斗争来争取独立、自由、幸福。因此，当我们看到《妻妾成群》中受过“娜拉”精神洗礼的“颂莲”逆行进入一个封建男权家庭时是震惊的，但同时也认为她会利用自己的新思想为武器去挑战，和僵硬顽固的旧社会做斗争并解放自己，就算她无法取胜，至少可以像娜拉那样出走。但是她没有成功，最终精神和

肉体都被摧毁。当“娜拉”在中国热度极高的时期，1923年鲁迅先生曾写过《娜拉走后怎么样》给这热度泼冷水降温，他探讨娜拉的悲剧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来。苏童这篇小说中的颂莲，正是对应了鲁迅对娜拉的推断。颂莲迷失自我，惩罚仆人致死，以及和其他妻妾争宠等行为展示了她被同化，她重塑自我失败，走向了被动的融入。这样压抑的结局，是苏童在表达一种对社会，对启蒙的悲观情绪吗？其实不然，他是在鲁迅的基础上，“不再把对国民性、劣根性的描述当做创作的目的，而是把他们当做血液里有机成分，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Li, 1988）这个处境就是真实和残酷的社会，苏童以这样悲观的形式，启蒙人们认识现实社会，并积极思考如何在与社会发生冲突时重塑自我。

此外，小人物的社会悲剧，更是苏童关注的重点。朱光潜认为悲剧必须具备的“崇高”的另一个内容是主人公身份的伟大。他说“人物的地位越高，随之而来的沉沦也更惨，结果就更有悲剧性，一位显赫的亲王突然遭遇灾祸，常常会连带使国家人民遭殃，这是描写一个普通人的痛苦的故事无法比拟的。”（Zhu, 1985）而苏童悲剧作品的主角大都是平民人物，Zhou（2019）从西方精神分析的角度，讨论了苏童悲剧人物的“创伤”；Zhao（2011）从审美角度分析苏童小说中的“感伤”格调。创伤和伤感都是悲剧的细节，也是这些平民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同时，在崇尚集体精神的中国，个人的悲剧不可避免，尼采认为“集体的存在生生不息，它不断破坏和毁灭，但也因此不断创造和更新，个人受难和死亡只是现象，无法撼动永恒的生命力量。（Ding, 2020）朱光潜继承了尼采的观点，他认为悲剧人物毁灭仿佛一滴水重归大海或孺子重归慈母的怀抱。（Zhu, 1985）苏童悲剧中的普通个人，经历创伤甚至死亡，但最后都在社会和历史上，只留有模糊的痕迹，有的彻底消失无声，毫无朱光潜强调的“大人物受难”在审美上带来的“快感”，苏童又一次拒绝了朱光潜。相反，这是苏童继承自鲁迅的“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创作理念，通过普通人的个人人生价值的毁灭，对中国人“集体”的忧虑，读者对大人物的生活是有距离感的，让每一个读者通过没有距离感小人物的悲剧，发现自我，面对集体，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悲剧具有启蒙的性质。

6.4 文化维度的启蒙

苏童的“枫杨树”系列表现乡村，“香椿树街”系列表现城镇。他曾说：“对于城市和乡村，究竟认同什么样的文明、什么样的价值观？精神和血脉联系的结果是分裂的、矛盾的，我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和谐的点。”（Su & Zhou, 2004）在以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强调伦理和道德的完善，而朱光潜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缺乏悲剧的原因，他总结说，中国人用很强的道德感代替了宗教狂热（Zhu, 1985）中国人是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的民族，他们不进行抽象思辨……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Zhu, 2006）这导致中国戏剧的结局大多是“大团圆”式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朱光潜以西方悲剧的标准来观察中国悲剧，这并不合理，这在苏童悲剧的文化维度可以证明，可以分为“文化的荒诞”和“文化的衰落”两种。

在第一次启蒙时期，鲁迅的《狂人日记》、《长明灯》和《阿 Q 正传》，都包涵着荒诞性的象征寓意。(Xu, 1996)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本身的行为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是荒诞的，但是狂人的抗争意识并没有被荒诞瓦解。(Wang, 2015) 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寻根文学派的作品常用魔幻、荒诞的手法，将想象与现实融合，试图用现代的目光看待传统，重新阐释传统文化，苏童并不被认为是寻根文学派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也大量展示了传统文化的荒诞，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地主陈文治为了自己病态的需求，收集少男的精液存入白玉罐中，作为滋补身体的药物。这与鲁迅《药》中，父亲给儿子买人血馒头治疗肺病的荒诞故事，在不同时空产生了启蒙上的联系。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宗族文化在乡村根深蒂固，么叔因为丢了灵牌，死后无法被安葬的宗族墓地，这也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而已经逃离乡村身在城市的祖父，在城市的楼顶上举行了传统的宗族仪式，被城市人看做可怕的“鬼火”。这种荒诞的描写，凸显某些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处境，启蒙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文化的衰落在苏童悲剧中更引人深思。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农民陈宝年进城发财，宁愿挥霍钱财也不照顾乡下悲惨的妻子孩子，任凭五个孩子病死；竹匠陈玉金为了进城发财而将自己的妻子砍杀在路上，对亲情的割舍和抛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无情背叛，而暴虐和戾气的滋生完全宣告优良的传统道德重返野蛮。《罌粟之家》中，当弟弟浑身腐烂，躺在垃圾中等死时，他要把最后的财产，自己的坟地送给哥哥，只求哥哥带他回家。但是哥哥却拿来了地契，让弟弟画押后再带他回家。此外，刘老侠为了得到土地，强迫女儿嫁给一个残疾人，这都是伦理和道德的衰败象征。这些作品中并不符合朱光潜的悲剧定义，但我们都看到了人间的苦难，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难道不是悲剧吗？而且，苏童并没有给我们解决苦难的“大团圆式”的答案。除了以上作品，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的结尾，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人们，只能每晚做梦，梦到故土、家族和亲属，回首遥望远远的故乡。在《我的棉花，我的家园》的结尾，从农村逃出来的书来，想让火车带他去城市，却被火车撞死，在临死之际，他又想到了故乡，然而故乡永远不能再回去了。这种“回不去”的哀叹，是苏童对“文化的衰落”的担忧，同时许多小说中都出现“洪水”意象，它暗示着传统文化就像诺亚方舟，它的毁灭对人和社​​会都是巨大灾难。可以说，苏童悲剧在文化层面也拒绝了以“快感”为创作目的，而转向了启蒙，但这和第一次启蒙时期又不同，当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强烈的，他的悲剧作品展现“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其他启蒙作家也都创作了“反传统”的作品。有观点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全盘反传统观念在 50 年代后演变成一场彻底的反智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Qiu, 2006) 而苏童的悲剧作品，可以认为是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一次修正，它让人们认识到，一个没有传统文化根基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它对优良传统的消失和堕落表达了担忧，同时也回应鲁迅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的悲剧观，启蒙人们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重返精神的“故乡”。

6.5 命运维度的启蒙

悲剧的命运感一直是朱光潜强调的，因为它代表的是那种无法用理智去说明的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感。(Ding, 2020)也许这是苏童悲剧唯一能符合朱光潜悲剧观的内容，有学者认为苏童决不愿意为笔下的人物的命运寻找一个明确的社会原因，比之对人物的社会决定论解释，他更愿意把人放在原始的生命力的方面，让人接受不可预测的，不可抗拒的宿命的安排。(Ge, 2003)

在苏童的悲剧中，多次表达“命运无常”的悲剧观，例如在《舒家兄弟》中，“河”意象贯穿全文。苏童用单独一段写到：对于街边的这条河，香椿树街的居民们毫无办法。河能淹死人，但人对河确实毫无办法。(Su, 1993, p. 163)这句话中能随时淹死人的“河”代表命运，而“人对河毫无办法”，表示在命运面前，人无法抗拒。此外还写到人们在河中打捞起一个出世不久的死婴，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暗示人的生老病死，都被“命运”的河流掌控。这与小说的结尾呼应，小说结尾写到一只被烧焦的小猫，用来代表舒农追求自由的努力，但它已经死亡，在河中沉浮，时隐时现，这都表示人的意志和努力只能在命运的河流中随波逐流，时刻都会被淹没而消亡。除了“河”以外，“洪水”也是代表命运的意象。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我的棉花，我的家园》《罍粟之家》等作品中，“洪水”的突然到来，将原本的秩序打破，将美好的生活摧毁。“洪水”不是历史的产物，不是文化的缺陷，也不是社会的罪恶，是一种无法摆脱无法抗拒的存在。

以上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也常常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但朱光潜认为，尽管人物性格在近代悲剧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Zhu, 1985)在《妻妾成群》中，苏童对旧时代中国女性注定的命运有多处表达，让人思索，对已知的悲剧性的命运的焦虑和挣扎到底意义何在。而朱光潜强调的悲剧必须具备的“崇高”的内容之一就是命运的斗争和挑战，但在《妻妾成群》以及其苏童其他作品中，主人公大多对命运屈从，甚至是融入和同化，这引发一种无比压抑和沮丧的气氛，从朱光潜的理论出发，压抑感不是悲壮，也就不是悲剧所带来的“快感”，所以苏童的悲剧在朱光潜的理论下，都不成立，可以说，苏童拒绝了像朱光潜那样，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去创造“过滤了的现实”，而是接受了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悲剧理念，创作了“为人生”的悲剧，以一种西方式的文学样式，融合了对人性的思考，对中国文化的重塑的愿望。

朱光潜还认为，仅仅对命运这种超自然力量表达“敬畏”远远不够成为悲剧，对于悲剧来说，致命的不是邪恶，而是软弱。(Zhu, 1985)悲剧人物必须与命运斗争，斗争失败所引起的崇高情感就是“悲剧快感”。于是苏童和朱光潜又一次发生了矛盾，在苏童的作品中，不论是“枫杨树”系列的农民，还是“香椿树”系列的小镇青年，他们在面对命运的恐惧时，所表现出来的，多是软弱的，逃避，也成为了苏童悲剧中常见的主题。《舒家兄弟》中，因为意外怀孕，舒工和涵丽跳河自杀就是突然的，他们甚至没有一丝反抗。在枫杨树系列中，每当洪水到来，人们通过船、马车等工具逃

亡，但是要么死在路上，要么失去故乡。苏童丝毫没有号召人们学习“大禹治水”的伟大气魄，而是尽情展现了人类的软弱，营造压抑氛围，这绝不能引起读者的“快感”。

苏童悲剧在命运层面将人的“软弱”和“逃避”作为主题，不仅与朱光潜悲剧理论中的“崇高感”相冲突，同时也与鲁迅强调的革命和斗争精神相反。但作者认为，如果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苏童和鲁迅一样，他们的作品都是时代的合理的产物。鲁迅是在中国落后挨打的危急时期，希望通过文学创作突破中国文化的困境和重振民族精神，他的作品不认为命运无常，作品中人物悲剧的命运都有社会原因，他希望人们通过社会革命“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Qian et al., 2007）而苏童悲剧大部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创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西方近代思想涌入，“先锋文学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引入中国，在文学实验的同时突出现代主义悲剧意识，反映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间的畸形异化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

（Xiang, 2010）那么如何面对命运的不可抗拒？苏童的答案不是斗争，而是接受。《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宝年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陈文治后悲惨地死去，他说：“我知道她活不过今年，怎么死也是死。我给她卜卦了。不怨陈文治，也不怪我，凤子就是死里无生的命。”（Su, 1993, p. 106）他将妹妹的死归于命运的无法改变的安排，命运是可以通过卜卦的方式来知晓的，但是无法改变，只能接受。小说《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书来在将要饿死之际，向三个铁匠讨饭，被铁匠扔出门外，但他笑着对铁匠们说：“我不恨你们，我恨棉花，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Su, 1993, p. 254）书来的笑和话语，证明他已经认识到代表命运的“天”的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而放弃了抗拒，坦然面对死亡了。在这一刻，苏童的悲剧与老庄哲学有了历史的连接，他虽然没有像鲁迅站在布道者的高度启蒙众人，但仍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没有“瞒和骗”地真实地展示命运的强大和人的弱小，他的悲剧本身包含的悲剧意义及其发生机制，不是在崇高的意义上加以发掘，而是展现生活的偶然，和因为一些细微的差别而在顷刻之间破碎不堪，但这并不表明悲剧感的消失，相反悲剧感得到加强，因为生活是如此脆弱，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为力，这才是活生生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悲剧（Chen, 1993）。苏童悲剧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常常突然到来，甚至接连而至，他启蒙读者逐渐将悲剧变成习惯和日常，将悲剧同化为平静，用一种新的方式，回应了鲁迅如何在 20 世纪末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也就是打破对命运的恐惧，当然，在此过程中，读者是体验不到“快感”的。

7. 结语与讨论

苏童小说中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不是肤浅的表达，本研究通过大量文本分析，总结出身体、精神、社会、文化、命运五个维度，它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由浅入深且螺旋上升，让读者感受苏童悲剧的强大力量。而且，本研究没有套用西方理论来审视苏童悲剧作品，而是将中国学者朱光潜和鲁迅的悲剧理论结合，从五个维度证明苏童的悲剧并没有走向朱光潜强调的悲剧“快感”，压抑感、恐惧感主导着阅读体验，这是一种将读者的阅读感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创作方式，其终极目的是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启蒙”精神，并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超越。相比之前的研究强调苏童悲剧的“先锋”性，也就是艺术的快感，否定苏童悲剧的“启蒙”性，本研究作出了相反且有充分实证的论断，这是对苏童研究的一大进步或突破。Kant (1996) 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中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是懒惰和怯弱使得人们在自然成年之后仍把自己的思想置于监护人之下，(Zhao, 2009) 而我们通过对苏童悲剧的研究发现，苏童悲剧作品启蒙人们独立运用自己的知性(Verstand)，勇敢地从摇篮车的舒适和快感中走出来，去体验真实的生命和严峻的命运。

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Bullock, 1997) 关于苏童悲剧在启蒙意义上的研究也同样没有结束。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研究文本的阅读具有一定主观性，这是文学研究不可避免的。此外，朱光潜和鲁迅的悲剧理论极其丰富，针对苏童或其他中国作家作品研究，仍有大量可发掘和利用空间。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地结合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以及对文学史和作家思想进行深入探寻，并结合中国文学理论，例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李泽厚或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的对悲剧的观点，可以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客观性。本研究在进行中发现，除了苏童悲剧与鲁迅的联系之外，还能发现他与沈从文的关联线索，例如对比《米》和《边城》的故事，他们在时间、地点上的关系，以及对人性的反向表达等。此外，苏童悲剧与老庄哲学在命运层面的表达也极有研究价值，鲁迅对老庄哲学持批判态度，例如他认为道家哲学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和无为的历史观，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国民精神”的培养有害(Liu, 2005)。鲁迅对老庄哲学的偏见有历史原因，而在当代中国，苏童的悲剧在某些方面与老庄哲学是契合的等等。研究理论也可以从宗白华、刘再复、李泽厚等中国学者的思想理论着手。因此，在未来对苏童悲剧的深度和广度的发掘仍有巨大空间和多样的角度。

致谢

衷心感谢中国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桂亭副教授，云南大学文学院赵玮副教授，泰国纳瑞宣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 Apichai Rungruang 助理教授和 Mr. Kyle Kohler 在研究过程中给与的支持与帮助。

参考文献

- Bullock, A. (1997).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Dong L. S.,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5). (In Chinese)
- Chen, S. H. (1999).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Chen, X. M. (1993) *Boundless challenges, - postmodernity in Chinese avant-garde literature*. Changchun: Times Literary Press. (In Chinese)
- Ding, E. S. (2020). The achievements of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6), 10-25. (In Chinese)
- Ge, H. B. (2003). Su Tong's imagist writing. *Social Sciences*, 2(003), 3. (In Chinese)
- Huang, J. (2008). Lu Xun's creation and Freud's doctrine. *Masterpieces Review*, 18, 31-34. (In Chinese)
- Jiao, S. Z. (1995). A monum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aesthetics: A trial review of Zhu Guangqian's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Drama and Literature*, 7, 47-53. (In Chinese)
- Kant, I. (1996).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ational criticism* (He Z. W., Tran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H. (2011).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Su Tong and Yu Hua: Coming of age in troubled tim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 Li, R. (1988). Self-talk about *Houtu*. *Shanghai Literature*, 10, 124. (In Chinese)
- Liu, X. P. (2005). Taoist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4(1), 79-84. (In Chinese)
- Liu, Z. (2006). *Studies on the them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In Chinese)
- Ma, C. X., & Zhang, G.B. (2017). An analysis of the tragedy of Songlian in Su Tong's wives and concubines. *Northern Literature*, 8, 31. (In Chinese)
- Pope, A. (1728). Preface to Shakespeare. *The pros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https://jacklynch.net/Texts/pope-shakespeare.html>.
- Pu, L. Z., & Wu, M. (2009, 10 August). Su Tong: I have been exploring the “difficulty of human nature”. *Nanfang Daily*.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08-10/75353.html>. (In Chinese)
- Qi, P. (2009). Su Tong talks about his new work: the biggest dilemma is to depict the attitude of father and son towards the issue of “sex”, *China News Network*.
<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04-09/1638452.shtml>. (In Chinese)

- Qian, L.Q., Wen, R.M., & Wu, F.H. (2007). *Thirty year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Qiu, F. (2006). Anti-traditional traditions have ended? *China Book Review*, 11, 7-12. (In Chinese)
- Shi, X. L. (2001). Three choices in modern Chinese tragedy theory.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31(4), 124-128. (In Chinese)
- Shi, X. L. (2008).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Chinese traged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38(6), 95-98. (In Chinese)
- Su, T. (1993). *Juvenile blood*.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1993). *Two sides of the world*.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04). *Petulia's rouge ti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05). *My life as emperor*.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13). *Shadow of the hunter*.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18). *The boat to redemptio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19). *Wives and concubines*.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2019). *Ric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Su, T., Li, J.Z., & Ye, Z.Y. et al. (2006, 11 February). Sexual depiction in fiction--Some famous writers and critics talk about sexual depiction in novels. *Nanfang Daily*. <http://news.sina.com.cn/o/2006-02-11/09578177688s.shtml>. (In Chinese)
- Su, T., & Zhou, X. M. (2004). Opening the wrinkles of human nature - An interview with Su Tong. *Fiction Review*, 2, 25-35. (In Chinese)
- Tao, Y. (2013). *Zhu's tragedy aesthetic analysi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Liaoni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 Wang, Q.Q. (2015). From the diary of a madman to Lu Xun's exploration of the "absurd" proposition. *Business*, 51, 91. (In Chinese)
- Wang, Z., & He, P. (2007). *Su Tong's research material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Wu, D.Y. (2012, 8 May).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historicist novels. *Hubei Daily*.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2/2012-05-08/126557.html>. (In Chinese)

- Wu, X.L. (2012). Narrative ethics and poetics of life beyond 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ment: O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n Su Tong's novels and its literary-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27(4), 17-21. (In Chinese)
- Xiang, B. Y. (2010). The disciplin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 of trage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8, 214-222. (In Chinese)
- Xu, P. Y. (1996).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dystopian literature on China's new period dystopian novels.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 Edition)*, 1, 29-32. (In Chinese)
- Xu, W. P. (2010). Su Tong: Writing a good long story is my ambition and a torment.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3-204. (In Chinese)
- Yu, H. (2019, 6 December). Su Tong: The novel will go where it wants to go. *Tianjin Daily*.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1206/c405057-31493057.html> (In Chinese)
- Zhang, H. T. (2009). The new enlightenment in China in the 1980s and the literary consequences of its disruption. *Social Scientists*, 5, 30-33. (In Chinese)
- Zhang, H. X. (2008). On Lu Xun's view of tragedy. *Journal of Yunmeng*, 4, 88-92. (In Chinese)
- Zhao, D. H. (2009).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rationality. *Marxism and Reality*, 1, 34-38. (In Chinese)
- Zhao, Y. R. (2011). *On the sentimental tone of Su Tong's nove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Jinan University. (In Chinese)
- Zhen, H. S. (2008). On the exodus of Nora in Ibsen's *A doll's house*. *Journal of Hubei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9, 57. (In Chinese)
- Zheng, Y. (2009, 11 May). Su Tong: A writer is just a person who writes letters to strangers. *Beijing Youth Daily*.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05-11/58993.html>. (In Chinese)
- Zhou, J. Y., & Shi, Q. X. (2020).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tragic fate of Songlian in *Wives and concubines*. *Northern Literature*, 3,7-9. (In Chinese)
- Zhou, Y. X. (1990)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i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Zhou, X. Q. (2019). *On the writing of trauma in Su Tong's novel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Chinese)
- Zhu, G. Q. (1985)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Zhang L. X., Tra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3). (In Chinese)
- Zhu, G. Q. (2006) *The psychology of tragedy*.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